

# 略谈林纾从事翻译事业的动机

孔艳坤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 林纾在 1899 年至 1925 年的 27 年间共发表长篇小说译作 153 篇, 相关翻译活动情况折射出其受内外部因素影响从事翻译事业的动机。晚清时局及作为赞助人的商务印书馆是影响林纾翻译的重要外部因素。作为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文学翻译家, 林纾的翻译动机主要同文学和西学相关, 包括开民智、了解外国文学及外国、鼓励时人学习西学、发展中国文学等。他因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而未在翻译动机上与之相符。此外, 林纾在翻译动机上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 既因其秉持文人士气、反对推翻清政府的政治主张不尚武, 又因其作为华夏儿女的拳拳之心在面对列强外侮时坚定弘扬尚武精神。爱国之心是其始终如一坚持下来从事翻译事业的动机。从出版机构和时间跨度这两个外部角度以及译者自身的角度出发, 探讨林纾从事翻译事业的动机, 有助于了解翻译与时代的关系并进一步丰富林纾文化研究。

**关键词:** 林纾; 翻译动机; 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23)05-0426-07

## Brief discussion on Lin Shu's motivations for his translation career

KONG Yankun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27 years from 1899 to 1925, Lin Shu published 153 full-length novels. Thes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reflected Lin Shu's motivations for the translation career owing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as his sponsor were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s for Lin Shu's translation. As a literary translator who "opens his eyes to the world", Lin Shu's translation motives were related to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earning, including enlightening people's wisdom in earlier times, knowing foreign literature and foreign countries, encouraging people at that time to learn western knowledge and developing Chinese literature. Standing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Lin Shu did not adjust his translation motives according to it.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motivation, holding strong patriotic feelings while doing translation, Lin Shu disagreed with the use of force since he was a literate who disliked the political proposition of overthrowing the Qing government, while he promoted the spirit of using force firmly while facing foreign aggression owing to his sincerity as a Chinese. Patriotism was always the motivation for Lin Shu's translation career. From two extern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publisher and the time span of Lin Shu's translation and what concerns the translator himself, exploring Lin Shu's motivation to engage in translation would benefi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the times, while enriching the cultural studies of Lin Shu.

**Keywords:** Lin Shu; translation motives; Xinhai Revolution; New Culture Movement

据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的记载,《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这一收录晚清小说书目最多的文

献在文学类一共收录翻译小说近四百种。<sup>[1]</sup>该数字虽在当今学界存在争议,但却反映出晚清翻译

小说风气之盛。作为晚清最早翻译小说的译者之一,林纾共译介小说字数达一千二百万。<sup>[2]424</sup>林译小说数量之多、时间之早毋庸置疑,影响之大、贡献之高也是公认的。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高度评价林纾:“古文不曾做过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有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有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sup>[3]215</sup>由此可知,林纾在文坛上的地位不容小觑,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文通过整理薛绥之和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一书所附的《林纾著译系年》发现,林译长篇小说的首部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于1899年出版,此后直至林纾1925年去世一年后仍有他翻译的长篇小说被首次发表。<sup>[4]433,607</sup>在这27年间,林纾共翻译发表了153篇长篇小说、20篇短篇小说。这20篇短篇小说中,有7篇于1916年、1917年发表在《小说月报》杂志上,均为英国作家曹西尔所作的《坎特伯雷故事书》中的作品,另外13篇是美国作家欧·亨利创作的《金矿股票》等作品,1925年发表在《小说世界》杂志上。林译短篇小说的出版机构和年份十分集中,相比之下所译长篇小说的出版机构和年出版数量则复杂得多,故本文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林译长篇小说的动机。国内学界虽已有关于林纾翻译动机的研究,如罗新璋先生的《翻译论集》,但专门论述林纾的翻译动机的论文数量较少,本文拟从林译长篇小说在其所处时代27年间出版的具体情况入手,从出版机构和年出版数量这两个外部观察角度,结合译者自身角度、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探讨其翻译动机。

## 一、林译长篇小说出版情况及其翻译动机分析

林译长篇小说的出版情况涉及林译长篇小说的主要出版机构、年出版数量及其翻译阶段的划分,从中可对林纾的翻译动机有一定的了解。

### (一) 林译长篇小说的主要出版机构及其翻译动机

从出版机构来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四

分之三以上的长篇翻译小说,其中110篇为商务印书馆单独出版,另外16篇分别是在《东方杂志》《小说世界》及《小说月报》等期刊上初次发表后再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及《小说世界》这三本杂志分别是1904年、1910年及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创立的,因此商务印书馆可以再版这三家杂志初版的林译小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林译长篇小说126篇,占林译长篇小说153篇的八成以上,其余27篇长篇小说的出版机构或是《小说月报》等期刊,或为中华书局、广益书局等最多只出版两种林译小说的出版机构。由此看来,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及发行林译小说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反过来讲,林纾的译作得以顺利发行也同商务印书馆的赞助有很大关系。

具体来看,商务印书馆同林纾关系之密切同其友人高凤谦有关。林纾与高凤谦相识起因于高凤歧,1882年林纾与同时期科举人高凤歧订交,并在后来认识其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三弟高凤谦。<sup>[5]59</sup>林纾司事京师译书局后,友人高凤谦进商务印书馆工作,高氏便约他专译西洋小说付梓。<sup>[6]</sup>高凤谦及其工作的商务印书馆在林译小说的过程中扮演了赞助人的角色,极有可能对林纾译本的选择乃至译本最后的定稿产生一定的影响,成为影响林译小说动机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这从林译小说在1903年之后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大量出版可以得以印证。高凤谦是在190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而林纾也是在1903年第一次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所翻译的长篇小说《伊索寓言》。林纾大部分翻译小说得以出版与高凤谦在商务印书馆的帮助有一定的关系。

林纾翻译作品的动机同商务出版社的赞助及其约稿相关。由于友人高凤谦的关系,林纾同商务印书馆保持长期合作并译介了大量作品。林纾本人最喜爱的作家应是狄更斯,但是据统计林纾翻译最多的作家却是哈葛德,如图1所示,现存文献也尚未发现林纾对哈葛德大加赞扬的内容。从1904年起开始出版所译哈葛德的作品《埃司兰情侠传》,一直到1920年出版完《炸鬼记》之后才不再出版哈葛德的作品,林纾共翻译了哈葛德的作品21篇。如果林纾对哈葛德的作品并不是格外钟爱,但却翻译了大量的哈葛德作品,那么这里的动机很可能就是满足出版社的约稿需要。从哈葛德译作的名字上看,多带有“鬼”“尸”等字眼,迎

合了时人猎奇、猎诡的心理。因此,出版社的动机或许又在于吸引读者以获得更大的发行量,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林纾在出版社的影响下也就有了迎合出版社和读者群体需要的翻译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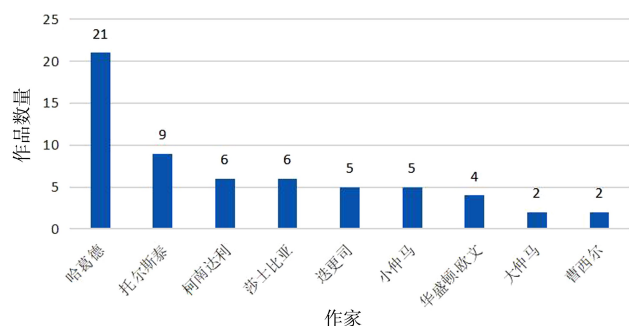


图 1 林译作家的作品数量

Fig.1 Numbers of different writers' works translated by Lin Shu

## (二) 林译长篇小说的年出版数量及其翻译阶段的划分

从年出版数量上来看,这 153 部长篇小说的发表在时间上有两个高峰期,一个出现在 1909 年,另一个则出现在 1920 年,其中 1920 年的年出版量最高,达 23 篇。钱钟书以 1913 发表的《离恨天》作为划分林纾两个翻译时期的界限,1913 年正好是在这 27 年的中间位置,这样也就相当于以时间长短将林纾的翻译生涯划分为两个部分:在 1913 年及其之前,林纾共发表 83 篇长篇小说;1913 年之后发表 70 篇,后期数量多于前期。但是,林纾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及《迦茵小传》等都发表在 1913 年之前。

尽管林纾在 1913 年之后发表的作品在今天已很少被提及,但是钱钟书对这些译作一棍子打死的评价似乎失之偏颇。林纾 1918 年出版的译作《现身说法》,将托尔斯泰带有自传体性质的作品《童年 少年 青年》用他带有文言气息的文体译出,译笔与前期相比并没有什么退步之处。因而,本文选择根据宏观环境上的历史与文化事件将林纾的翻译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是 1911 年之前,即辛亥革命之前的早期阶段,第二个是 1911 年到 1915 年,即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之前的阶段,第三个是 1915 年以后,即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的阶段。辛亥革命后正是清政府被推翻之际,政治环境上产生的大变化必然对林纾产生一定的影响,其翻译动机也可能同政治主张有所关联,因而用

来划分林纾的翻译阶段是可行的。选择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界限则是考虑到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从文体到思潮上的变化,因而也是有必要的。

## 二、“开眼看世界”的文学翻译家——林纾与文学和西学相关的翻译动机

林纾虽然不是晚清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甚至不懂外语,但他通过翻译大量文学作品彰显出其与文学相关的开民智、了解外国文学和西学并发展中国文学等主题相关的翻译动机。

### (一) 正确了解外国文学及外国的翻译动机

林纾早期的作品曾一度受到时人的赞誉,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他首次翻译的长篇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 年,林纾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小引》中谈及翻译该书的原因:“晓斋主人归自巴黎,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生请述之。主人因道,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暇辄述以授冷红生,冷红生涉笔记之。”<sup>[7]24</sup> 根据林纾自己的说法,林纾之所以会翻译这本书并走上翻译小说的道路其实要归功于他自身希望了解外国文学的心态以及友人王寿昌(晓斋主人)的帮助。

在早期,林纾对外国文学的译介还怀揣着开民智的动机。1901 年林纾在《译林》第一期的序中提到:“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sup>[5]26</sup> 林纾希冀通过译书达到开民智的目的,同当时中国屡遭外国入侵和战败失利有很大关系。当时,清政府在教学等方面的劣势已经显现,通过教育等方法强国、唤醒民众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身为一介文人,译书便成了林纾实现开民智的有效手段。1908 年林纾在《块肉余生述·前编序》中提倡发展教育:“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sup>[5]326</sup> 这不但体现了林纾希望借助教育改良中国社会的想法,也反映了林纾借助翻译外国小说让国人正确了解外国的动机。林纾所看重的是对于外国文学的正确认识,因而在 1901 年发表的《黑奴吁天录·例言》中提到:“译者就其原文,

易以华语,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sup>[8]163</sup>林纾不希望时人对西学持贬低的态度,而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西学中吸取养分,并对外国及外国文学形成正确的认识。

在翻译过程中,林纾对外国文学的态度也产生了从希望了解到认可的转变,并进一步巩固了他翻译外国文学的动机。1907年他在《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中写道:“西人小说,即奇恣荒渺,其中非富以哲理,即参以阅历,无苟然之作。西小说之荒渺无稽,至《噶利佛》极矣。然其言小人国大人国的风土,亦必兼言其政治之得失,用讽其祖国,此地谓无关系之书乎?”<sup>[9]209</sup>在从事翻译外国小说八年之际,林纾对西方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其中富含哲理、阅历,又有政治小说的成分,佳作良多,自然也就更乐意将更多的外国小说译介到中国。

## (二) 鼓励时人学习西学的翻译动机

林纾希望了解外国文学,并借此开民智、让国人了解国外的动机是他前期从事小说翻译的重要动机之一。这种心态很自然地演变成对于西学的好奇以及学习西学的渴望,并成为林译长篇小说的又一重要动机。1900年,林纾在《译林·叙》中指出时人对于西学不重视、不好学的现状:“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可胜。”<sup>[8]161</sup>林纾将清政府战败的原因归结为当时国人不好学、忽视西学,这种观点虽不全面,但也反映了忽视西学阻碍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弊端。林纾在1905年出版的《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中明确地论证西学是值得学习的:“其貌为儒者,则曰:‘欧人多无父,恒不孝于其亲。’……西人不尽不孝矣,西学可以学矣。”<sup>[5]139</sup>当时,很多人误以为西方是没有中国的孝道美德的,林纾通过翻译外国小说中的大孝子矫正这一观点,让时人认识到西方也是有孝子的,从而进一步说明西学也是可以学习的。林纾更是对青年学生给予了厚望,在1906年出版的《洪罕女郎传·跋语》中写到:“中国文章魁恃朋友口述,而于西人文章妙处,尤不能曲绘其状。故于讲舍中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sup>[5]164</sup>林纾鼓励学习西学的目的在于吸收西学中的新理念,从而提高中文的行文水平乃至推动学界的进步。

## (三) 与文学发展相关的翻译动机

从译者自身角度来讲,林纾翻译长篇小说的动机自然有同文学发展相关的部分,有时还会有几分抛砖引玉的意思。1908年,林纾在《块肉余生述·后编识语》中表示:“恨余弩朽,文字颓唐,不尽先生所长。若海内锦绣才子,能匡我不逮,大加笔削,则尤祷祀求之。”<sup>[5]350</sup>林纾在此谦虚地认为自己的文学水平不够高明,希望国内更有才华的人去翻译作家狄更司的作品,反映出其在翻译多篇小说之后仍对自己的水平不满意、希望能多出佳作的心态。

在翻译作品上,林纾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是很大的。这一点从林纾对翻译何种作品的主导权上可以体现出来。由于希望将更多有关拿破仑的事情译介到中国,林纾曾找到两种《拿破仑传》并请精通法文的人为自己口述,然而由于书中典故太多,没有相应的辞书可以检索,不得不放弃翻译。<sup>[4]82</sup>此外,林纾十分注重通过选择合适的作品,以佐证自己之前的译作所述为实。1901年,他在《黑奴吁天录》的例言中表示:“是书描写白人役奴情状,似全无心肝者。实则彼中仇视异种,如波兰、埃及、印度,惨状或不止此。徐俟觅得此种纪录,再译以为是书之左证。”<sup>[8]163</sup>由此可知,林纾也是会自己去寻找合适的作品来翻译的,而非仅靠口译者或者出版机构的推荐。较为遗憾的是,林纾之后翻译的作品未能出现佐证白人役奴惨状的内容,这种动机未能转化为成果。

林纾在翻译作品后,不止一次表露出由手头的作品出发去翻译相关著作的动机。1922年,林纾在再版的《兴登堡成败鉴》序中提到:“余不事译著,可一年矣。既得此书,虽不详不备,亦不能舍置,姑译之以问世。俟有名作,当更译之。”<sup>[8]184</sup>由于当时翻译的书中所记载的内容不够详细,林纾希望今后能翻译更好的与其相关的作品。

作为一名译者,翻译自己接触到的出色作家更多的作品也是林译长篇小说的动机之一。林纾格外喜欢迭更司(狄更司)的作品,他在1907年发表的《孝女耐儿传》序中提到:“迭更司书多,不胜译。海内诸公请少俟之。余将继续以伧荒之人,以伧荒之事,为诸公解醒睡可也。”<sup>[8]178</sup>林纾谦虚地表达出希望继续向时人译介迭更司作品的意愿。林纾前后共翻译了5部狄更司的作品,他对作家狄更司的喜爱从1908年发表的《块肉余生

述·后编识语》中也可一窥：“近年译书四十余种，此为第一。”<sup>[5]327</sup>

译作也是要面对读者的，因而，对于读者喜好以及当时翻译评论标准的迎合也是林纾小说的动机之一。《小说林》的创办人之一徐念慈在1908年发表的《余之小说观》中是这样分析晚清新小说读者的：“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能、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sup>[10]</sup>面对这样一群受旧学界影响颇深的读者，时人眼中确立了“翻译评论界‘译笔雅驯’和‘情节离奇’的评论标准”<sup>[11]</sup>。这样的评论标准也影响到林纾对于原作的选择。1908年，林纾在《西利亚郡主别传》序中提到：“是书非名家手笔，然情迹离奇已极，欲擒故纵，将成复败……”<sup>[8]179</sup>在“情节离奇”这样的评论标准的引导下，林纾选择顺其道而行之，满足读者和评论界的偏好。至于“译笔雅驯”这一标准，林纾凭借出色的古文功底占得先机。觉我在发表在《小说林》第十期的《余之小说观》中提到：“问何以崇拜之者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sup>[12]</sup>觉我不仅对林纾的译笔大加赞赏，更是将此看作林纾作品广受欢迎的原因。

#### （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翻译动机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林纾站在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一边，这同林纾自身观念保守且钟爱古文有关。林纾年长以后自号“畏庐”，取自祖母给他讲过的“畏天而循分”之意。<sup>[4]16</sup>尽管林纾的观念是传统而保守、“畏天而循分”的，但林纾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却对新文化运动起到铺垫作用，他还曾创作过白话诗歌。因而1983年蒋锡金先生在《关于林琴南》一书中称林纾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所从而发生的‘不祧之祖’”<sup>[13]</sup>。

1915年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林纾除了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阵营之外，在翻译上并没有松懈，他翻译出自身翻译生涯中全部的20篇短篇小说。林纾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废除古文的做法的，因而并没有接受新文化运动阵营完全使用白话的做法。1915年后林纾所翻译的长篇小说中有9部是托尔斯泰创作的，6部是哈葛德创作的，5部是莎士比亚创作的，4部是小仲马创作的，其余作家的作品数量至多只有2部。林纾在新文化运动

前就翻译过哈葛德、莎士比亚和小仲马的作品，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林纾继续翻译他们的作品的动机一方面可能是满足读者对这些受欢迎作家及其作品的需要，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应出版社的要求。1917年起，林纾开始发表其所翻译的托尔斯泰的作品，首部便是以死亡为主题的《人鬼关头》，之后还翻译了《现身说法》，直到林纾去世的1924年仍有《三种死法》问世。林纾翻译的这9部托尔斯泰作品都是商务印书馆或其创立的《小说月报》发表的。由此推断，林纾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仍可能是基于满足出版商的动机。

由于林纾本人是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的，他在翻译上自然也不会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而是仍然保持自己一贯的风格。1915年起林纾所翻译的长篇小说题目大多都带有“情”这个字眼，如《恨缕情丝》《香钩情眼》和《情海疑波》等言情小说，或是带有“鬼”之类的字眼，如《炸鬼记》这样的情节离奇小说，可见林纾主要还是以吸引读者为动机。相比之下，林纾在这一时期翻译的作品鲜有与爱国相关的，仅有《德大将兴登堡欧战成败鉴》等少量译作鼓励时人自强自立。

### 三、不尚武却有尚武精神的翻译家——林纾翻译动机中的家国情怀

林纾的翻译动机中既不尚武但又有尚武精神的部分与他的家国情怀有关：不尚武是因为其反对推翻清政府的政治主张，背后是其自身秉持的文人士气；而在面对列强外侮时却选择尚武精神，提倡自强自立。

#### （一）林纾前期带有政治主张但不尚武的翻译动机

林纾希望推动的远不止学界的进步，而是放眼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之进步。在动机上，林纾翻译长篇小说同其自身的政治主张有密切关系，而他的政治主张又是受时局影响而产生的。因而，林纾从事翻译事业的动机兼具内在与外在的因素。在政治主张上，林纾支持变法维新，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认定为救治中国的唯一道路，因而对辛亥革命不以为然。<sup>[14]60</sup>这种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在林纾翻译的部分小说本身及其序言中可见一斑。林纾在1908年发表的《贼史》序中提到：“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丛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sup>[5]330-331</sup>林纾将英国

强大的原因归功于改革,并借此劝告中国也开展一系列改良活动。

尽管林纾是支持改良运动的,但他却并不支持武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的道路。1905年京师学务处官书局初次出版、1926年商务印书馆再版的《拿破仑本纪》中,林纾曾评论道:“试观拿破仑雄图盖世,兵力振古。尚尔坐困。此亦足见天心矣。”<sup>[15]</sup>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林纾对凭借武力来夺取政权的途径就早已持不支持的态度。1901年秋林纾家居北京顺治门外永光寺的时候更是将自己的书斋称为“望瀛楼”,以寄托对当时被慈禧太后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皇帝的思念之心<sup>[16]83</sup>,可见其对封建帝制的拥护程度之深。1907年,林纾在《爱国二童子传·达占》中再次明确表示对武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反对:“所愿人人各有国家二字戴之脑中,则中兴尚或有冀。若高言革命,专事暗杀,但为强敌驱除而已,吾属其一——为卤?”<sup>[8]175</sup>林纾对武力革命不仅仅是不屑,乃是强烈反对,认为革命暗杀是让外敌渔翁得利的内耗。林纾支持改良、反对武力革命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形成,而且这种支持改良、反对推翻清政府的政治主张同其自身传统的文人士气息息息相关,辛亥革命后林纾更是选择11次谒光绪帝陵墓并以清朝遗老自居。<sup>[14]61</sup>林纾有骨气但过于保守,不能看清时局变化,最终避免不了其改良的政治理想落空的局面。

## (二) 林纾鼓励国人发扬尚武精神的翻译动机

虽然林纾一度反对辛亥革命这样在国内开展的武力革命,但是他对于武力抵御外国入侵是毫不含糊地支持的。他在1904年发表的《埃思兰情侠传》序言中提到:“自光武欲以柔道理世,于是中国姑息之弊起,累千数百年而不可救。吾哀其极柔而将见饴于人口,思以阳刚振之。”<sup>[16]101-102</sup>《林纾年谱长编》一书指明林纾此时是希望以西方人的尚武精神来救治中国国民精神上的衰惫之习。<sup>[16]102</sup>林纾在之后的译作中延续了弘扬尚武精神的翻译动机。1907年,林纾在《剑底鸳鸯》的序中表明他翻译该书的目的是鼓励时人发扬尚武精神,“余之译此,冀天下尚武也。今日之中国,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敝之习,追躐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少慰

乎。”<sup>[5]271-272</sup>林纾在这里谈及自己不能著书,因而只能译书来勉励国人都能尚武,从而击退外国侵略者。林纾之后更是尝试著书以弘扬尚武精神。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中就提到林纾根据庚子事变创作了《蜀鹃啼传奇》和《京华碧血录》。<sup>[1]57</sup>在目睹过清兵抵御外敌的无力之后,林纾明白中国在军事上有着很大的不足,因而希望通过翻译外国小说中的英雄传记,鼓励时人发扬尚武精神、做英雄,从而让国人能够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与外敌抗衡,挽救清朝摇摇欲坠的颓势。

林纾将鼓励时人发扬尚武精神的重任放在翻译外国英雄小说上同其译者身份有关。国人对于中国本土英雄完全可以通过戏曲、说书等形式来了解,而外国英雄小说的尚武精神却需要依靠林纾这样的译者才能得以了解。相比于中国本土的民族英雄,外国英雄小说可以提醒时人外国能够张牙舞爪同其弘扬尚武精神有关,因而中国为了击退外国侵略者也需要发扬尚武精神,通过浴血奋战来夺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兴盛。林纾通过弘扬尚武精神承担起晚清时期的中国译者应有的使命与担当,通过译介外国英雄小说的尚武精神激励国人勇敢地以武力抵御外侮。

## (三) 林纾矢志不渝的爱国翻译动机

根本而言,林纾的爱国之心才是其始终如一坚持下来从事翻译事业的动机。早在1897年,林纾与友人就因德国侵占胶州湾三次冒死到清廷御史台上书。<sup>[14]65</sup>之后,林纾更是出于爱国动机翻译了大量作品,1905年他在《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中发愿:“盖愿世士图雪国耻,一如孝子汤麦司之图报亲仇者,则吾中国人为有志矣!”<sup>[5]139</sup>当时,中国已经历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的劫难,国力衰微,林纾希望通过翻译作品让中国人鼓舞斗志、一雪国耻。

1900年,林纾在《译林·叙》中提到光绪和慈禧西逃的情形:“呜呼今日神京不守,二圣西行,此吾曹衔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即尽译西人之书,岂足为补?虽然,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燭,吾不能不然之。”<sup>[8]162</sup>国难当头,林纾在感到失望的同时仍抱有一份希望,选择继续翻译西方作品,改变国力衰微的局面。

除了一雪国耻,通过翻译让时人认识到外国企图让中国灭亡的狼子野心,谨防国家灭亡亦为

林纾从事翻译事业的重要动机。1905年,林纾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中为时人敲响警钟:“犹太人之寓欧,较幕乌为危,顾乃知有家,而不知有国,抱金自殉,至死不知国为何物。此书果令黄种人读之,亦足生其畏惕之心。”<sup>[5]143</sup>同年,林纾又在《鬼山狼侠传》叙中警醒国人切莫被奴化:“若夫安于奴,习于奴,恹恹若无气者,吾其何取于是?则谓是书之仍有益于今日之社会可也。”<sup>[5]143</sup>五十四岁的林纾自知无法在战场上保家卫国,便通过翻译长篇小说给时人再次敲响警钟。林纾常年不忘提醒时人保持警醒的心态,1908年在《不如归》序中再次提到:“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摭其胸臆。”<sup>[5]332</sup>所以林纾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其所翻译的长篇小说提醒时人警惕外国对华侵略的阴谋诡计,谨防灭国的惨剧发生。

为了避免灭国,林纾更是将实业强国的愿望化为翻译长篇小说的动机之一。1907年,林纾在《爱国二童子传·达占》中提倡青年学生从事实业:“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sup>[8]172</sup>结合上文鼓励学生学习西学来看,林纾对青年学生寄予无限厚望,希望他们能够学习西学并通过实业振国兴邦。林纾通过译作救国的做法也得到了康有为的认可。康有为曾在《庸言》上题《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一诗赠予林纾,首句便是“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sup>[4]424</sup>

#### (四) 林纾辛亥革命后的救国翻译动机

林纾于1912年开始在《平报》上开设专栏,连续两年在上面发表翻译的外论。<sup>[7]271</sup>1912年11月开始,林纾担任《平报》的编纂者,还针对时事发表了十篇评论。<sup>[4]167-168</sup>这一系列的创作活动和翻译外论的时间相对压缩了林纾用于翻译长篇小说的时间,加上“余自辛亥九月,侨寓析津,长日闻见,均悲愕之事。西兵吹角伐鼓过余门外,自疑

身沦异域”<sup>[8]182</sup>的悲伤情绪,导致1911年到1915年间林译长篇小说的数量大幅减少,但林纾在此期间所进行的包括翻译外论在内的译著活动仍然抱着救国的目的,这一点是没改变的。林纾在此阶段较多地翻译外论是希望帮助时人认清时局状况,从而更好地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摆脱国力衰微的局面。

## 四、结束语

林纾翻译长篇小说以1899年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为起点,之后其作品出版一共延续了27年。作为最早开始翻译外国小说的译者,林纾出版的小说达173种,其中短篇小说20种,长篇小说153种。除此之外,林纾还曾在报刊上发表翻译的外论。本文从出版机构和时间跨度这两个从外部观察的角度,以及译者自身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林纾从事翻译事业的动机:在出版机构上,满足出版商特别是商务印书馆的约稿和其读者群体的需要;在时间跨度上,分析林纾在三个阶段的发表数量及译作内容、序言,探寻其开民智、了解外国文学及外国,鼓励时人学习西学、发扬尚武精神,帮助时人认清时局、爱国图强等翻译动机;在译者自身角度上,体现出抛砖引玉、吸引更多从事翻译事业,将青睐的作品展现给读者以佐证之前的译作,宣传自己喜爱的作家及其作品,迎合读者喜好与当时的翻译评论标准等动机。林纾从内部角度出发迎合读者喜好的动机同其从外部角度出发满足读者群体的需要尽管相似,但却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带有林纾自身的译者主体性或者主观能动性的,后者主要是受出版机构影响而由外部因素催生的动机。从林纾翻译的外部及内部动机来看,翻译家从事翻译事业会受到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加以综合分析便可以更好地展现一个翻译家的形象,从而由翻译家的个人经历和动机折射出当时的翻译活动的时代特点,使得某一时代的翻译史记录更加翔实。

## 参考文献:

- [1] 阿英. 晚清小说史[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2]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424.
- [3] 胡适. 胡适文集: 3[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15.
- [4] 张俊才. 林纾评传[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

- [4] 郭嘉奇. 中国古建筑构件-悬鱼[J]. 西部皮革, 2019, 41(7): 127.
- [5] 刘淑婷. 中国传统建筑悬鱼装饰艺术[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81-153.
- [6] 谭显清. 简谈“悬鱼”及其文化内涵[J]. 中外建筑, 2014(10): 55-57.
- [7] 高云. 闽南传统古建筑装饰样式特点研究[J].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15, 2(S1): 75-77.
- [8] 戴志坚. 福建传统民居的分类探析[J]. 小城镇建设, 2001(9): 30-33.
- [9] 楚琨. 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万字纹艺术符号研究[D]. 株洲: 湖南工业大学, 2014.
- [10] 陈辉. 基础图案[M].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1: 199-200.
- [11] 徐雯. 服饰图案[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0: 320.
- [12] 张其成. 易医文化与应用[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5: 222.
- [13] 李海英, 段逸山. “天癸”的提出源于传统水本思想[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50(2): 113-120.
- [14] 曾建平, 罗红平. 论新时代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J]. 云梦学刊, 2023, 44(2): 1-9.

(责任编辑: 王圆圆)

.....

(上接第 432 页)

- [5] 陈平原, 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1897-1916[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6]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132.
- [7] 陈平原.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 1897-1916[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8] 罗新璋. 翻译论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9] 方华文.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5.
- [10] 王宏志. 重释“信达雅”: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9: 153.
- [11] 胡翠娥. 翻译的“政治”: 现代文坛的翻译论争与文学、文化论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156.
- [12] 孟昭毅, 李载道. 中国翻译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52.
- [13] 王秉钦. 20 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82.
- [14] 陈玉刚. 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
- [15] 洛加德. 拿破仑本纪[M]. 5 版. 林纾, 魏易,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6: 380.
- [16] 张旭, 车树昇. 林纾年谱长编: 1852~1924[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责任编辑: 王圆圆)